

◎ 傅军龙 李柏田 竹天润 著

晚清10年，是一个色彩纷呈又令人困惑倍生的时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给中国人的，又岂止是精神上的巨深刺痛……怎么办？理想与现实、主张与实践如乱麻般交汇，似乎注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

晚清

文化地图

1840至1911年的

中国文化人

团结出版社

◎ 傅军龙 李柏田 竹天润 著

晚清

文化地图

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傅军龙,李柏田,竹天润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

ISBN 7-80214-065-X

I. 晚… II. ①傅…②李…③竹 III. 文化史-中国-清后期 IV. K25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6995 号

责任编辑:朱利国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168×245毫米 1/16

印 张:22.75 插图:380幅

字 数:40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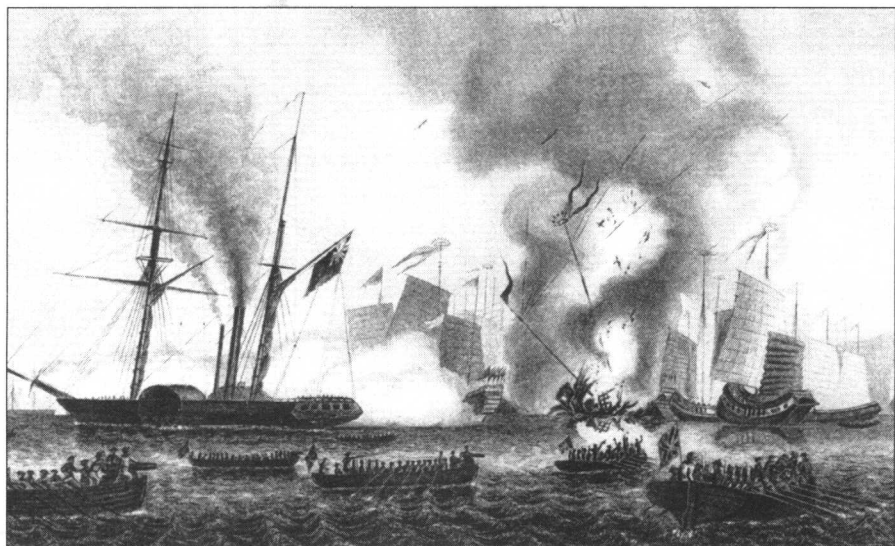
版 次:2006年4月第一版

印 次: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14-065-X/K·315

定 价:48.00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后,其现代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急剧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而且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西方的相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此图生动描绘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间中英双方虎门海战的场面。

目录

Contents

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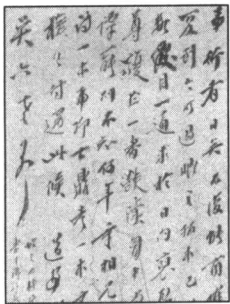
经世致用与文化启蒙

引言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与文化启蒙的先声

——鸦片战争之交的文化思想界

/ 2



一事平生无龃龉，但开风气不为师

——开启晚清思想启蒙先河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 (1792—1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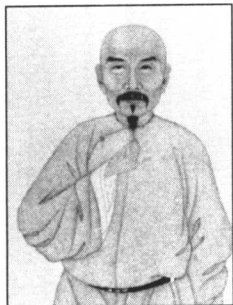
风发云逝、半生郁闷的人生 /13

日之将夕、悲风骤起的“衰世”挽歌 /18

龚氏思想源流的学理上探讨 /21

穷则思变、通经致用的思想启蒙 /23

乱弹：龚自珍的人生 /26



梦里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开启晚清思想启蒙先河的代表人物

魏源 (1794—1857)

今文经学的“健者”：变法，便民、利民 /31

幕僚和《皇朝经世文编》 /35

鸦片战争与《圣武记》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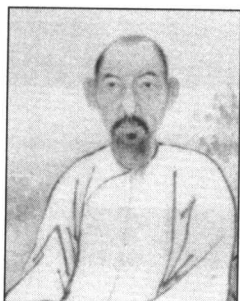
《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 /39

对欧美社会的初步认识：“巴厘满衙门”和弥利坚 /43

目 录 i

百年前的一桩学术公案 /44

“事功”与魏源的人生 /4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通经致用思潮的实践家

林则徐 (1785—1850)

时代思潮的有力推动者和实践者 /50

爱民勤政、廉洁自律的典范：“林公来，我生矣！” /53

林则徐和鸦片战争 /57

结语：“君恩每饭总难忘” /61

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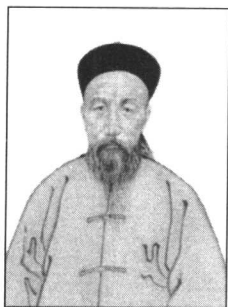
中卷 · 洋务运动与体用之争

引言

“中兴之治”的背后

——甲午战争前的文化思想界

/ 64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 (1811—1872)

“曾国藩热”的背后：我们向曾国藩学什么？ /69

是“曾剃头”、“刽子手”，还是清代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69

汉奸、卖国贼，还是为国分忧的民族有识之士？ /73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格致之学、官派留学生 /75

曾氏思想的源流和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79

“内圣外王”：立德、立行、立言 /82

曾氏的人格魅力 /84



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

——孤傲的“中兴名臣”

左宗棠 (1812—1885)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87
 “国士”、“楚材第一”、“绝世奇才”之誉 /90
 “左帅”与“曾帅”的恩怨 /93
 洋务运动的健将：致力于晚清海军建设 /96
 收复新疆的前前后后：《中俄伊犁条约》 /98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101
 “尽吾力、食吾功”的人生旅程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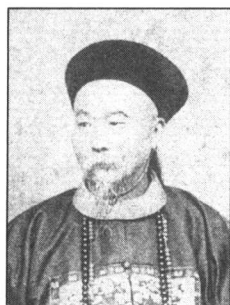


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晚清第一位使臣

郭嵩焘 (1818—1891)

鲜明的性格特点 /109
 剿杀太平军的“幕后英雄” /111
 亲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理性反思 /112
 苦差抑或肥缺：官场初次受挫 /116
 宦海再度浮沉：身败名裂的先兆 /118
 学者之本色：不成功的讲学 /121
 晚清第一次使洋风波：一片诟骂声中的远行 /122
 身败名裂：“断除仕宦，以求苟全” /126
 抑郁的晚景：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130
 郭氏的思想遗产 /132
 结语：郭氏的悲剧人生 /136



千秋献策贾生推，要思竹帛有殊荣

——是是非非的洋务运动主将

李鸿章 (1823—1901)

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139
 乃师曾氏之评：“少荃拼命做官” /139
 乱世中的雄起：文人李鸿章的蜕变 /142
 以淮军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144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 /149

- “海防”“塞防”之争与中法战争 /153
- 噩梦：中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 /159
- 战前中日双方的对比 /160
- 战争进程：平壤之战、黄海之战、鸭绿江防之战、
金（县）旅（顺）之战、威海卫之战、
辽东之战 /163
- 战争结局 /165
- 有关甲午战争的若干争论 /167
- 争论之一：翁同龢对海军经费不足负有多大
责任？ /167
- 争论之二：慈禧将海军军费挪作修建颐和园究竟是多
少？ /168
- 争论之三：李鸿章对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态度
如何？ /169
- 争论之四：甲午战争中中方是否必败？ /169
- 争论之五：李鸿章对战败负有多大责任？ /170
- 争论之六：清廷以李鸿章为代表对诸如越南、朝鲜等
“附属国”的态度是否正确？ /170
- 背负骂名的替罪羊：投置闲散？ /171
- “结强援”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173
- 李鸿章的环球考察 /174
- “李鸿章杂碎” /176
- “华尔遗产风波” /177
- 非要过一把“国父”瘾 /178
- 不忘孝敬西太后 /178
- 执意索要“格兰特手杖” /178
- 晚年李鸿章与《辛丑条约》 /181
- 盖棺论难定：说不尽的李鸿章 /185



新旧只今分半坐，庙堂端费斡旋功 ——洋务运动后期的健将

张之洞 (1837-1909)

- 少年才子：慈禧太后的“帘眷” /189
- 廉洁勤政的教育官员和《书目答问》著作权之争 /191
- 清流一党与“尸谏”风波 /193
- 抚晋：思想开始转变，热心洋务 /196
- 总督两广与中法战争 /198
- 督鄂十八年的洋务事业 /199
- 戊戌变法与《劝学篇》的问世 /204
- “东南互保”与镇压自立军起事 /206
- 滑稽的“经济特科”与“梁头康尾”的背后 /208
- “丁未政潮”与搭救袁世凯 /211

留给清廷的最后遗产 /21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的反思 /214
结语：“边缘化”的人生 /217

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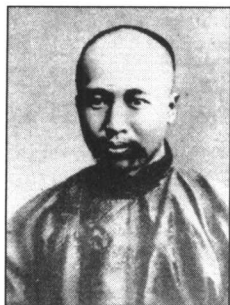
下卷 · 戊戌变法与“不中不西”

引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魅力

——戊戌变法之际的文化思想界

/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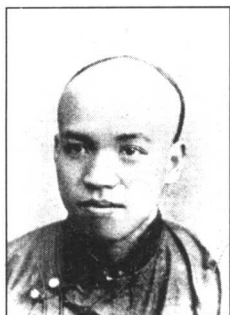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戊戌变法的领袖

康有为 (1858—1927)

- 南海康氏的家世与“圣人为”的由来 /225
- 康氏师承与礼山草堂 /228
- 张氏棒喝与倾心西学 /231
- 西学 + 礼学 = 维新思维 /233
- 康氏“道术”：《康子内外篇》的真谛 /236
- 政治声誉鹊起：第一次上书 /237
- 转向今文经学与万木草堂 /241
- 近代最大的学术公案：《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242
- “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序曲 /245
- 持续不断的上书 /247
- 学会与报纸：百日维新的思想动员 /248
- 迷雾重重的百日维新 /250
 - 翁同龢是否举荐过康有为？ /251
 - 是维新变法的主帅，还是暴得大名？ /251
 - “围园杀后”密谋的真相 /254
- 由保皇会领袖到回天乏术 /255
 - 日本：以帝师自居 /255
 - 加拿大：“保皇会”与“起兵勤王” /256
 - 从“国民宪政会”到“帝国宪政会” /257
 - 辛亥以后：“虚君共和”与“十不忍” /259
 - 回天乏术：复辟与“天人之学” /260
- “提督楼”内的死亡之谜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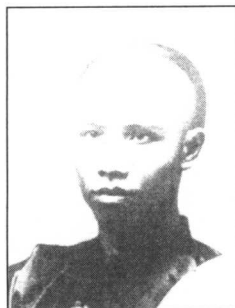
- 康氏人生：集成败毁誉于一身 /265
 康氏性格：偏激与执拗 /265
 康氏学问：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266
 康氏思想：儒学的近现代转换问题 /267
 康氏人品：介于君子小人之间 /268
 康氏私生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269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晚清思想启蒙巨匠

梁启超 (1873—1929)

- 童年：严格的家教与逼人的才气 /273
 家乡外的世界：转向西学、投身万木草堂 /277
 追随乃师，致力于思想启蒙 /278
 戊戌变法中的梁启超 /281
 流亡海外，思想上与乃师分道扬镳 /282
 革命还是改良：与革命党人的大论战 /285
 “流质善变”与真实的梁启超 /288



霜严露冷犹常事，劫火烧残草不肥 ——近代第一位侠义志士

谭嗣同 (1865—1898)

- 家庭：谭大善人与“严母慈父” /293
 环境：在“宣南”过早触摸死亡…… /295
 一场瘟疫，无法抚平的终生伤痛…… /298
 仲兄嗣襄带给幼弟的影响 /299
 剑与刀：侠士性格的养成与神州游 /302
 谭氏的师友们 /305
 《仁学》与谭氏思想的特色 /307
 关于谭氏临终前的三则补白 /309
 余语：侠义志士的另一面 /312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近代文化思想界的巨人

严复 (1854—1921)

- 近代文化思想界的巨人 /315
- 中日甲午战争与严氏的《辟韩》 /318
- 戊戌变法和严氏的译述《天演论》 /320
- 走向另一视阈的严氏 /322
- 思想巨人的矛盾人生 /323
 - 争议之一：如何看待严复后期的历史污点？ /323
 - 争议之二：如何看待“信、雅、达”的翻译原则与严复的译作？ /325
 - 争议之三：严复是新权威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代表人物？ /326
- 结语：思想巨人的遗憾 /327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炳麟 (1869—1936)

- 深厚的家学渊源与师承名儒 /329
- 与康有为的异同：改良与革命 /331
- 《尙书》与“章氏学” /332
- 剪除辫发与《谢本师》的近代影响 /334
- “苏报案”与吴稚晖的笔墨官司 /337
- 国粹思潮与刘师培夫妇的恩怨 /341
- 辛亥革命前与孙中山的纷争 /344
- 章氏的文化品格 /347

参考资料总目 /349

后 记 /354

晚清文化地图

上卷



经世致用与
文化启蒙

引言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与文化启蒙的先声

——鸦片战争之交的文化思想界

时代思潮与社会环境变迁

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开篇中曾言：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于衰熄。

梁氏的这一描述，道出了一国某一阶段内之所以能成为“时代思潮”，必须具有共性的特点。其中，“环境之变迁”是重要因素之一。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思潮的叠续演进，莫不与中国社会环境之变迁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乾嘉时期是清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期，预示了“衰世”即将到来。那么，转折期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之变迁，对理解晚清时代思潮的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转折期的社会环境变迁做一粗线条的描述。

社会环境变迁之一：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的相对有限之间发生尖锐冲突。

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全国大小男妇已达三亿七千四百六十万人之多；与康熙四十九年(1710)相比，以乾隆皇帝自己的测算，增长了十五倍还多^[1]，

[1] 康熙四十九年(1710)所载，全国人丁户口为二千三百三十一万多，这只是全国成年男子的统计，并未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实际上全国人口数远不止此。

以至这位自诩为“十全老人”^[1]的盛世雄主感叹道：

我国家承天眷护，百余
年天下太平，化泽涵濡，休养
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
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
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数
十人之食，该藏已不能如前
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
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
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閭阎生
计，诚有关系……日食不继，
益形拮据，朕甚忧之。

（《清实录》乾隆朝）



继康熙帝后，清朝又迎来了“乾隆盛世”。以佛教中的文殊菩萨自比，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文治十分青睐。殊不知，隐藏于盛世浮华下的大清王朝已是危机四伏……

洪亮吉画像。这位当时的著名学者指出，人口的过快增长是导致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并对社会弊端给予严厉批判。嘉庆帝对他因此不满，曾亲自撰写上谕予以斥责。结果，洪亮吉因言获罪、被贬伊犁。

【1】 乾隆曾作《御制十全记》，以满、汉、蒙、藏四种文本，建碑勒文，来歌颂自己的“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受廓尔喀降，合谓十。

按当时学者的计算,人口几何级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人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既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以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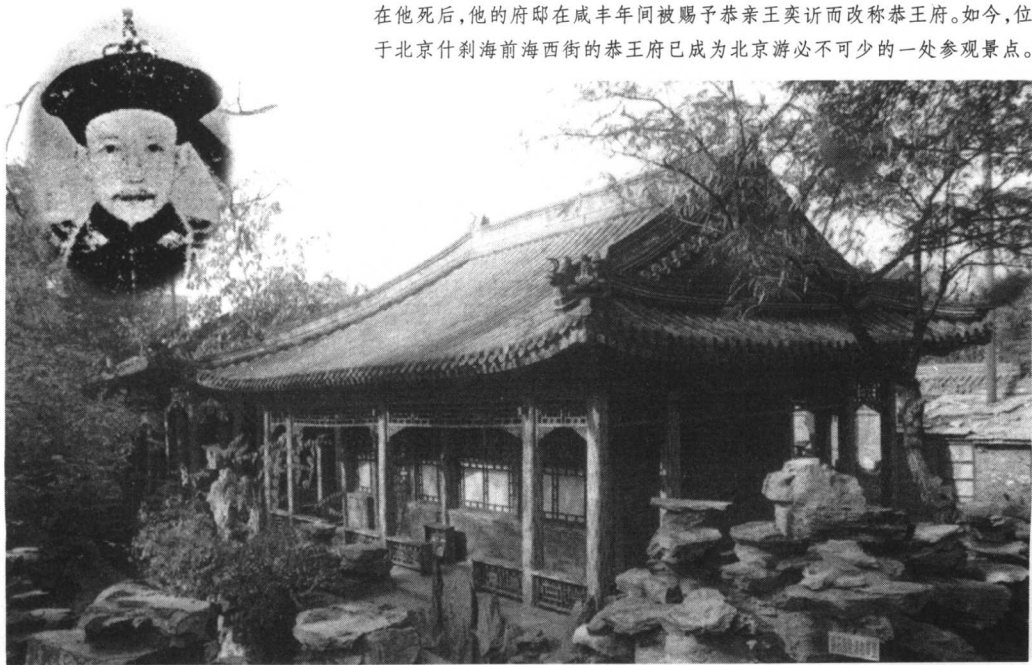
而乾嘉时期正常年景下全国平均亩产量约为一石,每人每年的温饱水平为四石,而人均耕地只有三亩;到道光年间人均耕地下降到只有两亩两分五厘,粮食只有两石多,即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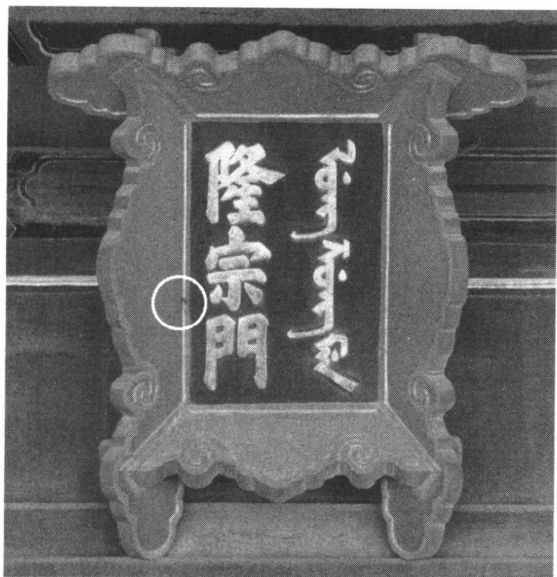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有限耕地之间的矛盾,必然使耕地和粮食成为稀缺资源而导致其价格窜升,急速加剧贫富两极的分化,进而形成为占有稀缺资源引发土地兼并狂潮,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社会环境变迁之二:贪污公行,求财纳贿,不思进取,百务废弛,吏治的总体性腐败、污染并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使“天灾”演变为“人祸”,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白热化。

嘉庆初年的和珅案,成为有清一代的天字号大案。“和珅跌倒,嘉庆吃

和珅,被视为乾隆晚期吏治腐败的典型,遭到责令自杀、抄没家产的处罚。在他死后,他的府邸在咸丰年间被授予恭亲王奕訢而改称恭王府。如今,位于北京什刹海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已成为北京游必不可少的一处参观景点。





位于紫禁城乾清门广场西侧的隆宗门，是进入内廷的必经之处。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天理教首领林清，于嘉庆十八年（1813）率徒众进攻皇宫，在隆宗门附近与官军展开激战，失败后被擒杀。此事给予清廷以极大震动。圆圈处即是当年林清等人留在门匾上的箭头。

饱”的民间谚语，是对乾隆纵容和珅贪黷与嘉庆“宰肥鹅”之举最形象的讥讽。与和珅同为朝中重臣的讷亲等人，其操守皆十分成问题，“讷亲横，于敏中贪，傅恒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进旋退，缄默取容而已”（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嘉庆初年的两广总督毕沅、广东巡抚福宁、广东布政使陈准，或“不以听政为是”，或“广纳苞苴”，或“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囊而后免”，时人骂三人是“毕不管、福要钱、陈倒包”（徐珂：《清稗类钞》）。朝中重臣、封疆大吏均如是，上行下效，整个吏治的腐败也就可想而知，“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法治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刘蓉：《养晦堂文集》）。

自然灾害对任何社会而言都存在，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别具一番意味。“治世”时期可以尽最大程度减轻自然灾害的力度，“乱世”时期则相反。自乾隆中期以后，旱涝一类自然灾害在传统农业区频繁发生，给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破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走上武装暴动的险途，以秘密会社或宗教名义组织暴动，如华南地区的天地会、川楚陕白莲教徒的暴动，具有浓厚的“官逼民反”的特征。以川楚陕白莲教暴动为例，自嘉庆元年（1796）至九年（1804）持续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仅耗费清廷饷银就高达二万万两，约相当于清王朝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把大清王朝搞得百孔千疮。

社会环境变迁之三：同时期西方社会正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英国的工业革命或曰现代化急速向前推进，并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经北美独立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中西方相遇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中西方最早相遇是明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随后是西方传教士的陆续来华。西学东渐由此开始。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第一幅全国地图的诞生和命运，令人十分感慨，及至怅然不已。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在法国传教士的指导下，采用西方近代技术、经实地测量后绘制成的《皇舆全图》，是中国第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后在此基础上于乾隆朝中期又制成《乾隆内府铜板地图》。历经明末开始的西学东渐，至少是在地学方面结出了硕果：西方地理学知识，如地圆说、地球五带说、五大洲说、太阳中心说和相关的测量方法传入中国。从名称上看，“内府”当然属于皇家，自然也就是枕中秘籍，外人无从染指。这说明西方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只能囿于皇家和上层社会的极小圈子里，真正是躲在深闺人不识。这无法不叫人在怅然的同时，气难平。

西方使团、商人无法叩开的大清国门，继而被以药品为名义的鸦片打开。据考证，英国首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是雍正五年（1727），数量只有二百箱，可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道光十八年）竟高达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五箱。贸易逆差，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国家经济一塌糊涂，“自道光三年



罂粟花

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黄爵滋：《敬陈六事书》），而大清帝国每年财政收入也就不过三、四千万两左右。这无疑使大清的财政接近了崩溃的边缘，“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时代给大清国出了一道难题：如何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